

# 风险感知对大学生新冠预防行为及锻炼行为坚持性的影响

谢戴西<sup>1</sup>, 王晓东<sup>2</sup>

(1. 深圳大学 体育部, 广东 深圳 518060; 2. 深圳大学 师范学院(教育学部)体育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 要:** 以社会背景因素和风险感知为切入点, 对大学生新冠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作为风险信息源的风险资讯和搜索互动 2 个社会背景因素, 对风险感知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感知对预防行为坚持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控制感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分别具有显著负向和正向影响。研究认为: 将疫情防控预防行为界定为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双变量进行考察, 可以探究双变量受社会背景与风险感知不同因素的作用机制及效应, 提示在疫情常态化防控过程中需要在行为策略上提供更科学的细分指导。

**关 键 词:** 学校体育; 风险资讯; 风险感知; 预防行为; 锻炼行为; 坚持性

中图分类号: G8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1)05-0100-08

## The influence of risk perception on university students' persistence in preventive behavior for COVID-19 and exercise behavior

XIE Dai-xi<sup>1</sup>, WANG Xiao-dong<sup>2</sup>

(1.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2. Institut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of Normal College,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Taking social background factors and risk perception as the entry poin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persistence in preventive behavior and exercise behavior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wo social background factors namely risk information and search interaction as the source of risk information,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risk perception significantly; risk perception had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ersistence in preventive behavior; the sense of control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and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ersistence in preventive behavior and exercise behavior respectively. The study holds that defining the preventive and controllable behavior of COVID-19 as bivariate including preventive behavior and exercise behavior to investigate, could explore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bivariate affected by different factors from social background and risk percep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in the course of regula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or COVID-19,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more scientific and subdivided guidance and instructions on behavioral strategy.

**Key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risk information; risk perception; preventive behavior; exercise behavior; persistence

2020年初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蔓延世界,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因新冠肺炎疫情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疾控预防措施,包括封城、停航停业、禁止公共集会、推荐疾控预防行为等。虽然大多数国家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但新冠病毒变异

毒株的出现以及季节变化等因素,许多国家出现了比第一波更为严重的疫情暴发。疫情初期,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公众预防指南汇编”<sup>[1]</sup>,防控预防指南推荐行为包括:减少到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活动,外出佩戴口罩,随时保持

收稿日期: 2021-02-03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成年感染者愈后居家体能康复训练方法研究”(GD20CTY01)。

作者简介: 谢戴西(1989-),男,讲师,硕士,研究方向: 体育与健康教育、竞赛策划与管理。E-mail: 296474938@qq.com

通信作者: 王晓东

手卫生, 注意营养、适度运动等。其中, “注意营养、适度运动”作为“保持健康习惯”被列入推荐行为。实践表明, 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效果主要取决于公众对疫情防控推荐行为的遵从意愿和预防行为的坚持。有研究指出, 在疫情发展初期人们为防止受到感染, 能够遵循推荐行为且在一定程度上比较配合, 但随着疫情发展对预防行为产生厌烦和抵触甚至是抗拒情绪。因此, 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公众预防行为的坚持性成为当前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到目前为止, 关于新冠疫情的研究大多是作为对疫情的快速反应开展的, 而以社会背景因素与风险感知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的研究较少。此次疫情的长时间迁延及局部出现反复态势, 为风险感知与预防行为坚持性的预测提供一个可供深入研究的独特而真实的社会场景。尽管新冠疫苗的研发和应用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战胜疫情的曙光已然初现, 但从人类进入 21 世纪短短 20 年时间内, 经历 3 次相关呼吸系统综合征大流行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角度而言, “新冠疫情不会是最后一次大流行”<sup>[2]</sup>。因此, 本研究可为面临类似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风险沟通和行为应对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 1 理论背景及研究假设

### 1.1 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主要研究人们对自然和人为灾害的情感和认知反应, 探索风险感知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特定背景下因素是如何与态度和预期行为相关的。风险感知很早就被关注和研究, 随着 21 世纪两件重大社会风险事件的突发, 即 2001 年“9.11”事件和 2003 年 SARS 冠状病毒疫情, 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的风险感知研究受到多学科高度关注并得以迅速发展<sup>[3-4]</sup>。

在过去 20 年间相继出现 SARS 冠状病毒疫情和 H5N1 以及 H1N1 相关呼吸系统综合征的大流行, 使得多种理论及模型被应用于风险感知研究, 包括健康信念模型、动机保护理论、理性行动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等<sup>[5]</sup>, 这些理论从各自核心观点出发解释风险感知与预防推荐行为的关系。涉及到人们健康行为改变的核心预测因子主要包括: 感知到的威胁严重性, 即个人感受到风险威胁的严重程度; 感知易感性, 即是否很可能患上某种疾患; 感知到的威胁脆弱性, 即个人感知到威胁后, 自身应对能力大小的评估; 感知到的自我效能, 即对于自己有能力采取保护行为的信心。这些预测因子在应对健康风险的研究中大部分被认为是有效的。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人们发现这些理论主要关注风险感知如何影响行为, 而对于风险感知最初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却很少受到关注<sup>[6]</sup>。

Prati 等<sup>[7]</sup>应用社会认知模型对风险感知与疫情防控推荐行为关系进行相关研究, 通过对健康行为理论概括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模型整合, 将风险感知和社会因素作为影响推荐行为的关键决定因素, 模型包括感染的可能性、感知的严重性等经典风险感知预测变量, 同时在社会背景因素中, 考虑到新闻媒体风险信息对预防行为影响的增值作用而将其纳入模型。事实证明, 新冠疫情对生命和健康的威胁形成了人们的风险感知, 而风险感知又会影响人们的应对策略和行为改变, 由此提出假设 H1: 风险感知受社会因素影响并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有正向影响。

### 1.2 控制感

控制感是关于个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预期社会结果的信念<sup>[8]</sup>。控制感也是一种基本心理需求, 对个体的应对方式、行为和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与预测作用。控制感的满足可以消解生活压力和保持心理弹性, 有多项研究证实控制感与抑郁和焦虑呈负相关; 较强的持续控制感对行为有更积极的影响以及有助于获得更高的生活满意度, 而较低自我控制水平与一些消极的生活结果相关<sup>[9]</sup>。在风险感知领域的研究中, 发现控制感显著负向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作为控制感 2 个维度的初级控制与次级控制在不同时间点对 PTSD 的影响中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sup>[10]</sup>。在食品安全事件的风险感知及应对行为中控制感越高, 产生抵制应对行为的可能性越低, 相反产生积极应对行为的可能性越高<sup>[11]</sup>。在新冠疫情全球健康危机中, 疫情大流行期间的适应力可能会因个人控制感以及如何管理恐惧和焦虑而有所不同。除了对感染新冠病毒的恐惧外, 无法进行日常锻炼和被迫改变行为模式可能会导致个人感觉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力减弱。尽管疫情大流行继续威胁生命并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 但人们有可能适应疫情并保持积极心理的旺盛感。研究表明, 控制感有助于调节个体对新冠疫情的恐惧, 通过影响旺盛感提高日常生活参与度, 同时控制感在疫情风险恐惧与旺盛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sup>[12]</sup>。

控制感在预测风险威胁性时与风险感知形成方向相反的作用, 控制感越高往往会产生风险否认而较少采取风险应对预防行为。但另一方面, 由于国内疫情控制一直稳定有序进行, 具有较高控制感的人可能较多进行积极预防的锻炼行为。因而, 在考察风险事件时间跨度很长的过程中, 控制感可能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有很好的预测作用。由此, 提出假设 H2: 控制感对预防行为坚持性有负向影响, 对锻炼行为坚持性有正向影响。

### 1.3 风险资讯

从风险感知的角度而言,新冠疫情大流行也成为信息大流行,而作为风险信息源的风险资讯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强烈影响公众舆论<sup>[13]</sup>。研究证实了媒体对风险感知及预防行为的作用,即在全球新冠大流行期间,公众依靠媒体传达的准确信息以便作出相关健康保护行为的决定<sup>[14]</sup>。媒体可以潜在影响公众对健康危害的看法,通过对疫情进展多方面的追踪与分析,在分析与告知人们严重危害和风险方面处于独特地位。此外,媒体资讯还影响个人对政府和疾控预防部门在应对疫情威胁方面是否具有成效的看法,从而影响个体在社会环境中采取的应对行为<sup>[15]</sup>。互联网已经成为各种媒体渠道和信息的来源,包括官方网站、社交网络等<sup>[16]</sup>。Wang 等<sup>[17]</sup>研究发现,超过 90% 的被调查对象从互联网获得新冠信息,包括新冠的传动路线、药物和疫苗可用性和有效性、旅游建议、海外新冠控制经验、各国病例数与位置以及新冠预防建议。由此,提出假设 H3: 风险资讯对风险感知和控制感有正向影响并以风险感知为中介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产生影响。

#### 1.4 搜索互动

在社会认知过程中,个体对人和事件的理解与评价受到情境背景的极大影响<sup>[18]</sup>。社会认知理论强调认知塑造了个人感知和应对风险的方式,同时已有研究还强调“社会环境会影响行为改变的程度和速度”<sup>[19]</sup>。当今互联网广泛普及的社会背景因素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比起以往任何年代对这种塑造的作用都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疫情期间我国大众主动获取疫情相关风险资讯的意愿强烈。据人民网研究院与百度联合发布的疫情大数据指数显示,用户通过百度搜索与浏览新冠肺炎相关信息的频率日均超过 10 亿人次。在具体内容方面,疫情最新进展、疫情地图、武汉肺炎最新消息、疫苗研发等关注度最高,占总搜索量的 24%。防疫相关知识包括口罩的使用、如何区分新冠肺炎和流感、收快递是否会感染病毒等主题,排在第 2 位,占总搜索量的 20%。每天 10 亿次的海量搜索,反映人们对疫情的空前重视与关注。疫情期间大众浏览最早上线的丁香园疫情地图,不到 10 个月的时间就超过 44 亿人次,同时大多数国家均出现在线搜索的突增高峰<sup>[20]</sup>。Utunen 等<sup>[21]</sup>调查发现,在疫情爆发的前几个月最大的流量来源是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70% 的人口每天至少关注一次或多次冠状病毒新闻<sup>[22]</sup>。在疫情出现反复期间,人们更为关注新冠疫苗研发、新冠变异毒株、冷链病毒携带、进口水果出现病毒等相关资讯。

疫情期间国外公众主要通过社交媒体获取相关信息,2020 年 4 月在受病毒影响最严重的地区,Facebook

所有通讯服务的使用都增加了 50% 以上,语音和视频通话在同一时间内增加了一倍<sup>[23]</sup>。近年来研究强调社交媒体的重要性,在危机事件期间社交媒体使用增加并继续呈指数级增长。社交媒体为人们提供一种未经过滤的、最新的交流方式和危机中的情感支持,人们通过社交媒体交流最新疫情资讯和有效应对方法,交流自身的应对经验并表达对亲朋好友的关心、担忧等<sup>[23]</sup>。风险资讯搜索与社交互动是疫情防控期间紧密联系的过程,可将其并称为“搜索互动”。由此,提出假设 H4: 搜索互动对风险感知和控制感有正向影响并以风险感知为中介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的坚持性产生影响。

#### 1.5 媒体信任

风险资讯的接受程度取决于人们对媒体的信任程度,可信度高的媒体向公众提供信息可以有效促进他们采取适当的健康保护行为,可见对媒体的信任有望对预防行为的采纳产生积极影响。有研究指出,人们认为广播新闻和报纸比社交媒体更可信。面临风险时人们信任的媒体成为避难媒体,在感受风险威胁的时刻会回到这里寻求信任<sup>[24]</sup>。由此,提出假设 H5: 媒体信任对风险感知和控制感有正向影响并以风险感知为中介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产生影响。

通过梳理风险感知相关文献,本研究提出基于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的风险认知综合模型,对大学生疫情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进行实证研究。模型构建思路与以往研究有较大区别。首先,在社会背景因素方面,此次新冠疫情处于互联网高度普及的社会背景下,互联网 3 大基础应用用户分别达到即时通信用户规模 8.96 亿、网络新闻用户规模 7.31 亿、搜索引擎用户规模 7.50 亿<sup>[25]</sup>。因此,风险资讯、搜索以及社交互动可能成为影响风险感知的核心社会背景因素。其次,此次新冠疫情较之以往相关呼吸综合征,无论是从事件的时间跨度或是疫情的反复性而言均更为复杂,处于这种背景下考察预防行为坚持性研究较少。再次,以往对疫情预防行为的研究中主要将预防行为作为综合变量进行评估,本研究将预防行为划分为双变量,可以更全面考察两种行为坚持性的影响途径及不同特征。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2.1 样本与来源

采用问卷星对两所大学共 23 个学院的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调查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中旬。在问卷调查工作之前,对所有参与调查的人员进行培训,明确操作流程。调查过程中,让受试者回顾疫情开始至当前的行为状况并填写问卷。共发放问卷 629 份,剔

除 83 份答题缺失、答题出现前后矛盾的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 546 份,有效回收率 86.8%。

## 2.2 变量与测量

所有的变量题项均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评分,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完全同意”。通过内部一致性系数(cranbach's alpha,  $\alpha$ )、平均方差提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组合信度(construct reliability, CR)对变量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各项指标的检验及标准范围为  $\alpha \geq 0.55$ 、 $AVE > 0.50$ 、 $CR > 0.70$ 。风险感知变量和风险感知的“控制感”变量来源于“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量表”<sup>[26]</sup>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风险认知量表”<sup>[27]</sup>,两个量表的研制具有理论基础的同源性和应用领域的一致性。“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量表”基于 Slovic 风险感知心理测量学模型、情绪感受(经验)和认知判断(理性)的双过程(dual-process)理论模型,以及 Howard 等发展的健康威胁自我调节模型进行开发。以“直觉感受”“认知判断”“心理表征”进行构建,量表具有优良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风险认知量表”的编制基于风险认知及心理测量范式、健康信念模型、保护动机理论等风险认知影响因素,对风险感知的测量由疫情严重性、可控性、健康影响严重性和可能性 4 个维度构成。

风险感知采用 3 道题项进行测量。“感染的风险担忧”变量主要观察直觉判断,测量题项为“担心感染新冠病毒”;“感染的易感性”变量主要观察认知判断,测量题项为“觉得自己容易感染新冠病毒”;“疫情严重性”变量主要观察警觉判断性,即认知与感受的心理表征,测量题项为“新冠会对身体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alpha$  为 0.88,平均方差提取值 AVE 为 0.73,组合信度 CR 为 0.89。风险感知的“控制感”采用 2 道题项进行测量,分别为“新冠疫情预防状态下我所处的生活环境安全”“我相信新冠疫情防控有很好的效果”。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alpha$  为 0.62,平均方差提取值 AVE 为 0.70,组合信度 CR 为 0.53。

风险资讯、搜索互动、媒体信任参照以往流感大流行 Angeles<sup>[22]</sup>和 Fraustino<sup>[23]</sup>的相关研究进行条目编写和测量。

风险资讯的测量题项为“我关注新冠疫情新闻报道”“我关注病毒变异及防护相关知识”“我关注疫苗研发进展”。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alpha$  为 0.81,平均方差提取值 AVE 为 0.64,组合信度 CR 为 0.84。搜索互动主要测量使用搜索引擎的习惯与频率,获取风险资讯的信息通道,社交媒体使用的情况及互动主题,测量题项为“我习惯每天搜索疫情相关资讯”“我经常与

朋友交流疫情相关信息”。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alpha$  为 0.77,平均方差提取值 AVE 为 0.65,组合信度 CR 为 0.78。媒体信任主要测量对各类媒体包括主流媒体、门户网站、自媒体、朋友圈等相关新冠疫情信息的信任程度,测量题项为“我相信主流媒体的疫情资讯报道”“我相信广播电视的疫情资讯报道”。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alpha$  为 0.74,平均方差提取值 AVE 为 0.61,组合信度 CR 为 0.75。

预防推荐行为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公众预防指南汇编”。本研究对预防推荐行为采用双变量划分,“预防行为”来源于防控预防指南的第 1 和第 2 部分,概括为“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保持社交距离”。“锻炼行为”来源于防控预防指南的第 3 部分“保持良好卫生和卫生习惯”推荐的“注意营养,适度运动”<sup>[1]</sup>。测量题项为“疫情防控期间我坚持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保持社交距离”“疫情防控期间我保持锻炼习惯,每周锻炼 3 次及以上”。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alpha$  为 0.80,平均方差提取值 AVE 为 0.68,组合信度 CR 为 0.81。

## 2.3 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

采用 AMOS 22 软件,选择最大似然法对假设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根据模型拟合的修正指标对模型进行适度修正。模型修正过程中,逐条删除潜变量之间未达显著性的假设路径。同时,模型修正合理释放测量误差项  $e_{18}$  和测量误差项  $e_{19}$  的协方差,通过增列这两项测量误差项间的协方差可减少卡方值统计量<sup>[28]</sup>。修正后的模型,所有路径均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 ( $P < 0.05$ )。整体模型的主要适配度指标情况: $\chi^2/df=2.730$ , RMSEA=0.056, CFI=0.959, GFI=0.944, NFI=0.938, RFI=0.918,可见整体模型拟合较好。

## 3 结果与分析

通过模型的整体拟合和修正得到最终模型(见图 1),各变量之间的箭头指向反映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而路径系数则反映各变量之间预测关系的影响程度,即系数越大,影响越显著。最终模型显示,本研究提出的 5 个假设得到部分验证。每个假设得到部分验证的主要意义在于:变量之间影响关系的总体方向和影响作用的显著性得到进一步明确。结构方程在处理各变量关系方面的优势在于可以对所有变量进行同步估计,这是其优于回归方法之处。以 H1 为例,原假设风险资讯以风险感知和控制感两个变量为中介间接影响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的同时,风险资讯还直接影响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在同步估计这些变量的相互作用时,模型估计支持风险资讯以风险感知为中介对预

防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同时,风险资讯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具有直接预测作用。原假设风险资讯以控制感为中介影响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的路径未通过检验

而被删除,因而凸显风险资讯对风险感知的预测作用以及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的直接影响(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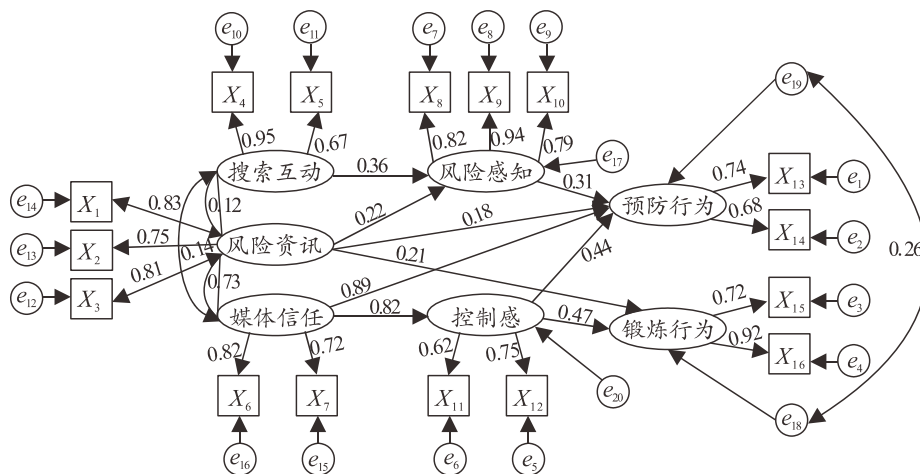


图 1 结构方程拟合结果及标准化路径系数

### 3.1 风险资讯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的影响

风险资讯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双变量均存在显著影响效应。首先,对预防行为坚持性的直接影响效应为 0.181,并以风险感知为中介对预防行为产生的间接效应为 0.070,总效应为 0.251。其次,风险资讯对锻炼行为坚持性的直接影响效应为 0.213。在疫情初期和常态化防控以及疫情出现反复期间,大学生通过各种媒体获取疫情信息、了解疫情发展及整个社会应对状况。媒体风险资讯对疫情反复态势和发现新冠变异毒株的快速反应及报道,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生对疫情发展的主动关注,增强了对疫情的风险感知并转化为具体的个体预防行为,这与研究报道的“疫情是一项去地方化的社会事件,表明了疫情对全社会的无差别辐射、动员和统合”<sup>[29]</sup>的已有结果一致。即使没有处于疫情中心区,大学生依然具有强大的风险感知能力,这对预防和锻炼行为坚持性也起到重要作用,即他们通过对多种媒体风险资讯的获取与分析,调节自我应对行为。

### 3.2 搜索互动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的影响

搜索互动对风险感知的直接影响效应为 0.357,并通过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预防行为,间接效应为 0.112。疫情期间大学生身处校园这样一个人群相对集聚环境,使得风险环境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当风险环境和风险资讯都存在不确定性时,往往会通过搜索引擎及其他资讯渠道获取信息,以便对信息作更为全面的判断与分析,降低对环境感知的不确定性并采取相应应对行为。此次问卷调查中,所有大学生均

有持续使用搜索引擎进行风险资讯的搜索行为,尤其在出现多地散发、集聚性疫情以及新冠变异毒株时,具有通过多媒介风险资讯搜索和进行分析的日常行为习惯。

大学生作为社交活跃群体,对微信的使用尤为频繁。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使用微信更多用于社交而非获取疫情风险资讯,在日常社交媒体使用中风险资讯成为交流主题的一部分。Scherer 和 Cho 在 Burt 的传染网络理论基础上,提出风险感知的社会网络传染理论。该理论假设存在风险感知网络,即共享或创造相似风险感知个体的关系分组。通过这种方式,频繁接触个体分享相似的信息、态度、情感和性格,并对健康预防行为起重要作用<sup>[30]</sup>。Morton 等<sup>[31]</sup>在关于健康风险资讯传播对于阅听人风险感知的研究中发现,大众传媒与人际网络作为风险感知的影响源相互依赖并发挥作用,而本研究结果与这些研究均较为一致。通过模型路径与效应分析还发现,大学生的搜索互动对风险感知的易感性、严重性、患病担忧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并通过这些风险感知变量的评估对预防行为起作用。但搜索互动对锻炼行为坚持性的影响没有显著性,这可能与锻炼行为是大学生原有的生活习惯,而在以疫情风险资讯和风险感知的中心话题交流中处于边缘有关。

### 3.3 媒体信任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的影响

媒体信任通过两条路径影响大学生预防行为坚持性。第 1 条路径是媒体信任对锻炼行为坚持性起显著的直接作用,直接效应为 0.888。第 2 条路径是以

控制感为中介间接影响预防行为坚持性,间接效应为-0.361。两条路径对预防行为坚持性影响的总效应为0.527。媒体信任对控制感的直接效应为0.825,并通过控制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锻炼行为坚持性,间接效应为0.391。此结果说明在社会背景因素中,媒体信任对大学生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的影响作用很大。媒体可信度通常分为信源可信度、媒介可信度、资讯可信度3类。在风险社会中的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是大众最信任的媒体,人们对信息的信任程度是影响其态度和感知的关键<sup>[32]</sup>。随着互联网应用的广泛与普及,传统媒体依托互联网的发展,经过最近10年的媒介融合过程已形成“三微一端”(微信、微博、微视频以及客户端)全覆盖的融媒体格局,不仅在技术手段上与“新媒体”同步发展,而且内容和质量的权威性、影响力的地位与作用更是不可取代。在此次问卷调查中,大学生信任媒体排名最高的前3位分别是“中央媒体”“电视广播”“新闻门户网站”;信任程度最低的分别是“自媒体”“非专业公众号”“微博大V”,说明大学生在风险资讯的来源与搜索过程中具有较强的区分性及选择性,能够对风险资讯的可信程度进行分类筛选与评估并采取行为决策。

### 3.4 风险感知和控制感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的影响

风险感知在社会出现各种类型灾害以及公共卫生事件中,被广泛研究且证实是有效的预测变量。本研究模型结果显示,风险感知对预防行为坚持性的直接影响效应为0.313,这与风险感知主要与疫情的易感性、严重性等一系列心理过程有关,说明风险感知对疫情预防行为的预测具有较好对应性。

控制感对预防行为坚持性的直接影响为负效应,效应量为-0.437。控制感对风险承受和风险否认具有重要影响,控制感越高,产生抵制应对行为(例如戴口罩等预防行为)的可能性越低,而产生积极应对行为(例如锻炼行为等)的可能性越高<sup>[11, 33]</sup>。模型结果说明,风险感知与控制感在预测不同类型预防行为具有不同的方向结果。高控制感者在现实生活中有可能由于控制感的偏倚而对预防行为不重视,或对较长时间的预防行为感到厌倦而减少采取预防行为。另一方面,控制感对锻炼行为的坚持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这与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社会经济生产活动恢复正常,国内社会大环境下的疫情比大多数国家明显趋好有关,这些因素对大学生的控制感具有积极影响并对锻炼行为坚持性起正向影响作用。

控制感对预防行为双变量两个不同方向的预测结果需要进一步具体分析。当模型仅考虑控制感对预防

行为及锻炼行为坚持性的影响效应时,控制感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的预测具有不同方向结果。当模型将社会背景因素与控制感的总效应进行整体考察时,由于媒体信任对控制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媒体信任通过控制感对预防行为的总效应为0.527。换言之,媒体信任抵消了控制感对预防行为的负面影响并促进预防行为向积极方向转化,无论是风险感知或是控制感均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因此,尽管控制感高的大学生可能倾向于采取更少的预防行为,但常态化防控的社会背景通过媒介途径影响大学生,大学生通过主动关注疫情资讯,表现出更高的社会配合意愿并采取与社会防控推荐行为相一致的行为决策,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及疫情反复态势下坚持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从模型综合结果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典风险感知的预测模型和预测因子更多受到社会背景因素的影响。因此,风险感知的研究需要拓展到社会与文化背景层面进行探讨,才能更全面地解释与预测风险感知与行为应对的潜在机制。

以往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或有关呼吸综合征的研究中,通常将预防行为作为一个独立变量来考察。预防行为是面对风险情境中一种新的、需要学习与适应的行为,包括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和减少聚集,其作用是通过对新病毒体的直接阻隔来减少感染风险。锻炼行为是一种原有的生活习惯或具有体验感的行为,其作用是通过锻炼提高个体抵御感染疾患的能力。在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生活、学习和防控彼此融入,社会处于一种正常生活的回归状态,因而常态化防控可能更多与原有的生活习惯相关。研究发现,在“疫情”期间民众体育参与比例明显上升。大学由于减少聚集和减少外出,锻炼行为也出现了增多趋势<sup>[34]</sup>。同时,通过锻炼可以“满足个体最基本的情感诉求,极大地缓解了疫情期个体的社会焦虑”<sup>[34]</sup>。将疫情防控预防行为划分为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双变量进行考察,可以更好地发现社会背景因素和风险感知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的具体影响途径和不同效应。基于风险感知的预测因子对这两类行为存在不同的影响作用,从风险感知与疾控预防行为的研究延伸而言,将疫情疾控预防行为进行合理划分,有助于对风险感知在不同阶段对行为影响的机制、作用途径与效应的洞察,为疫情常态化防控提供有效的预防理论和行为策略。

## 4 结论

1)在互联网应用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作为风险感知信息源的风险资讯来源的多态性,搜索引擎应

用的广泛性以及社交媒体的活跃性,对新冠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作用显著增大。

2)风险资讯、搜索互动、媒体信任通过部分直接路径影响大学生的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决策及行为应对。此结果说明,经典风险感知的预测模型和预测因子更多地受到社会背景因素的影响,风险感知的研究需要拓展到社会与文化背景层面进行探讨,才能更全面地解释与预测风险感知与行为应对的机制。

3)媒体信任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路径对大学生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起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大学生总体上表现出更高的社会配合意愿并采取与社会防控推荐行为相一致的行为决策。

4)风险感知越高,对新冠预防行为坚持性产生正向影响效应就越大。控制感越高,不管是主观偏倚或客观评估,对预防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影响效应,对锻炼行为的坚持性则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提示在疫情常态化防控的情况下,需要在行为策略上提供更科学的细分分类指导。

5)将疫情防控预防行为划分为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双变量进行考察,可以更好地发现社会背景因素和风险感知对双变量的影响途径和不同效应。

##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公众预防指南汇编: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通用预防指南[EB/OL]. [2021-01-27]. <http://www.nhc.gov.cn/jkj/s3578/202001/3a13637e1a9249a2b6047f34b772b5e6.shtml>.
- [2]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Preventing the next pandemic zoonotic diseases and how to break the chain of transmission[EB/OL]. [2021-01-06]. <https://www.unep.org/news-and-stories/statements/preventing-next-pandemic-zoonotic-diseases-and-how-break-chain>.
- [3] SLOVIC P, PETERS E. Risk perception and affect[J].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6, 15(6): 322-325.
- [4] 孙梦如, 蒋莉, 郭沁. 健康传播视角下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风险感知与行为的研究路径[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 50(3): 118-119.
- [5] LEPPIN A, ARO A R. Risk perceptions related to SARS and avian influenza: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urrent empirical research[J]. *Behave Med*, 2009(16): 7-29.
- [6] BREWER N T, CHAPMAN G B, GIBBONS, et al.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perception and health behavior: The example of vaccination[J]. *Health Psychol*, 2007(26): 136-45.
- [7] PRATI G, PIETRANTONI L, ZANI B. A social-cognitive model of pandemic influenza H1N1 risk perception and recommended behaviors in Italy[J]. *Risk Analysis*, 2011, 31(4): 645-656.
- [8] LACHMAN M E, WEAVER S L. The sense of control as a moderator of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health and well-being[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4(3): 763-773.
- [9] THAKUR D, SHASHWATI S. Doing well & feeling well: Do self-control and flourishing go hand-in-hand?[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sic and Applied Research*, 2019, 9(3): 826-839.
- [10] 曾旻, 周宵, 伍春, 等. 创伤暴露程度对中学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 控制感的调节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7, 25(1): 62-64.
- [11] 范春梅, 贾建民, 李华强. 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公众风险感知及应对行为研究——以问题奶粉事件为例[J]. *管理评论*, 2012, 24(1): 163-166.
- [12] ELEMO A S, AHMED A H, KARA E. The fear of COVID-19 and flourishing: Assess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sense of control in international student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2021(5): 8-11.
- [13] ROSLYNG, METTE-MARIE, ESKJÆR, et al. Mediatized risk culture: News coverage of risk technologies[J]. *Health, Risk and Society*, 2017, 19(3-4): 112-129.
- [14] GARFIN D R, SILVER R C, HOLMAN, E A. The novel coronavirus outbreak: Amplification of public health consequences by media exposure[J]. *Health Psychol*, 2020, 39(5): 355-357.
- [15] NGUYEN T, HENNINGSEN K H, BREHAUT J C, et al. Acceptance of a pandemic influenza vaccine: A Systematic review of surveys of the general public[J]. *Infect Drug Resist*, 2011(4): 197-206.
- [16] AVERY E. Contextual and audience moderators of channel selection and message reception of public health information in routine and crisis situations[J].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2010, 22(4): 378-403.
- [17] WANG Z H, YANG H L, YANG Y Q. Prevalenc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ymptom and the demands for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and interventions in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COVID-19 epidemic: A large cross-sectional study[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20, 275(10): 188-193.
- [18] WYRE R S, RADVANSKY G A. The comprehension

- and validation of social information[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9, 106(7): 89-118.
- [19] VAN J J, BAICKER K, BOGGIO P S, et al. Using social and behavioural science to support COVID-19 pandemic response[J]. *Nat Hum Behav*, 2020(6): 1-12.
- [20] 人民网研究院与百度联合发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搜索大数据报告[EB/OL]. [2021-02-01]. <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20/0201/c209043-31566685.html>.
- [21] UTUNEN H, NGUILLE N, PIROUX C, et al. Global reach of an online COVID-19 course in multiple languages on open WHO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0: Analysis of platform use data[J].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20, 22(4): 1-13.
- [22] ÁNGELES M, FUENTES-LARA C, CRISTINA NAVARRO E L. Covid-19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in Spain: Exploring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seeking behavior and message reception in public's evaluation[J]. *El Profesional de la Informaci ó n*, 2020(29): 2-4.
- [23] JULIA-DAISY F, BROOKE-FISHER L, YAN J. Social media during disasters: A Research synthesis and road map. *Social media and crisis communica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283-295.
- [24] SEJIN P, BRANDON B, JOHNSON-AVERY E. Information channel preference in health crisis: Exploring the roles of perceived risk, preparedness, knowledge, and intent to follow directives[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19, 45(5): 10-17.
- [25]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1-01-28]. [http://www.cac.gov.cn/2020-04/27/c\\_1589535470378587.htm](http://www.cac.gov.cn/2020-04/27/c_1589535470378587.htm).
- [26] 席居哲, 余壮, 鞠康, 等. 新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量表的编制和效度验证[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5(4): 131-141.
- [27] 代亚君, 郝艳华, 吴群, 等.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风险认知量表编制及信效度检验[J]. *中国公共卫生*, 2020, 36(2): 227-231.
- [28] 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AMOS 务实进阶[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 193.
- [29] 闫岩, 温婧. 新冠疫情早期的媒介使用、风险感知与个体行为[J]. *新闻界*, 2020(6): 50-55.
- [30] SCHERER C W, CHO H A. Social network contagion theory of risk perception[J]. *Risk Analysis*, 2003(23): 261-267.
- [31] MORTON T A, DUCK J M. Communication and health beliefs: Mass and interpersonal influences on perceptions of risk to self and others[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1, 28(5): 602-626.
- [32] METZGER M J, FLANAGIN A J, EYAL K, et al. Credibility for the 21st Century: Integrating perspectives on source, message, and media credibility in the contemporary media environment[J]. *Annal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03, 27(1): 293-335.
- [33] SJÖBERG L. Factors in Risk Perception[J]. *Risk Analysis*, 2000, 20(1): 1-12.
- [34] 黄亚玲, 郭静, 黄非, 等. 新冠肺炎疫情期体育行动消解社会焦虑的社会学审视[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0, 46(4): 11-14.